



论韩愈阳山之贬 及其文学评价

陈胜林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论韩愈阳山之贬 及其文学评价

陈胜林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论韩愈阳山之贬及其文学评价

陈 胜 林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佛山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121,000

1996 年 2 月第一版 1996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2255-2/I·2007

定价:8.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韩愈研究的专著,填补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对韩愈在阳山的文学创作研究的空白。韩愈阳山之贬是韩愈一生中遭贬时间最长的一次,长达一年零二个月。本书就韩愈为什么贬官阳山和韩愈在阳山的思想、生活、情趣以及这一时期的韩愈文学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具体的论述和阐释,对《山石》写作系年等问题进行了考证。见解独到。本书还对韩愈写于阳山的诗、赋、书、序、记、箴等二十四篇作了详尽的注释和今译。

目 录

序	陈新璋 1
试论韩愈贬阳山之因	3
论韩愈在阳山	10
旖旎风光寄衷情	
——韩愈写于阳山的山水诗述评	19
韩愈《山石》写作年代地点考	36
憎其道而爱其人	
——析《送灵师》、《送惠师》	45
韩愈前半生的自述	
——《县斋有怀》分析	62
从韩愈诗作中看韩愈在阳山的生活情趣	
——《县斋读书》等四首诗分析	71
《别知赋》赏析	78
评韩愈在阳山写的赠序、书信和杂记	82
韩愈的自我警戒和鞭策	
——《五箴》分析	87
韩愈写于阳山的诗文译释	93
1、县斋有怀	93
2、答张十一	100

3、山石	101
4、次同冠峡	103
5、同冠峡	104
6、贞女峡	105
7、宿龙宫滩	106
8、新竹	107
9、远览	108
10、千岩表	108
11、闻梨花发赠刘师命	109
12、梨花下赠刘师命	109
13、县斋读书	110
14、李员外寄纸笔	112
15、醉后	113
16、刘生	114
17、送惠师	117
18、送灵师	124
19、别知赋	131
20、送区册序	134
21、送杨支使序	136
22、答窦秀才书	139
23、五箴	143
24、燕喜亭记	148
跋	152

序

陈新璋

韩愈是我国唐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河南人，但和广东颇有缘分：36岁被贬为岭南阳山县令，52岁被贬为岭南潮州刺史。在历史上，韩愈对广东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曾因编制教学参考录像资料的需要，于1985年到广东阳山、连县、潮州、潮阳等地了解和考察韩愈当年在当地的生活遗迹和后人对他的纪念情况，写成《韩愈在广东》的电视文字稿。次年，华南师大电教中心据此制作成电视教学参考片，由中央电教馆公开发行。

我经过考察，对于文献上所记载的韩愈“有爱在民”这一点有了感性的认识。在封建官僚机构中，县令和偏远地方的刺史显然是小官。但小官也可以渔肉乡民，“官逼民反”。而地方文献和民间传说中有关韩愈的记载，以及有关韩愈的文物古迹中，对韩愈却是有褒无贬。这多少可以说明韩愈为官是清廉的。就其政绩来说，从现有材料看，在潮州刺史任上比在阳山县令任上要突出，但就其影响来说，却是各有千秋的。

由于工作繁忙，我无暇在电视文字稿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文献资料写成韩愈在广东的专著。但我知道阳山和潮州都有研究韩愈的专家，他们迟早会写出这方面的著作。果然不出所

料,前年曾楚楠先生给我寄赠他所写的《韩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出版),近日陈胜林先生给我送来他写的《论韩愈阳山之贬及其文学评价》书稿并告知书稿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使我深为欣慰。曾、陈二先生的著作问世,了结了我久悬的心愿。

陈胜林先生曾长期在阳山工作,对韩愈在阳山这个课题有长期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这本书稿从辨析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入手,依据韩愈的有关诗文和文献资料,以及当地的文物古迹,对韩愈在阳山的生活、交往、思想、心态以及这一时期的韩愈文学作了系统的具体的论述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少著者的创见。陈先生还对韩愈在阳山所写的诗文加以详尽的译释,这对读者了解这方面的史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对于地方历史文化流传和借鉴也是很有意义的。

陈先生要我为该书作序,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是为序。

1995年5月1日于华南师大

试论韩愈贬阳山之因

韩愈(公元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杰出的散文家和诗人,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迁监察御史,职责是谏正皇帝和弹劾百官。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这次遭贬的原因,后人有几种说法:

一是认为是由于“极论宫市”。《旧唐书·韩愈传》说:“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新唐书·韩愈传》说:“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

二是由于韦执谊、王叔文之党排斥所致。方崧卿《韩子年谱》中说:“然公《寄三学士》诗尚云:‘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则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又《岳阳楼》诗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县弹射,斥逐恣欺诳。’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因此,方崧卿认定韩愈阳山之贬,是遭受“二王八司马”的暗算和排挤。清人全祖望完全赞同方崧卿的看法,他在《鲒琦亭集外编》卷三十一《书韩文公集后》中说得明明白白:“退之先生阳山之贬,实为韦、王之党所排,诸家皆无识者,洪庆善、方崧卿始备得其颠末,足以补《唐书》之

漏。”清代王鸣盛在他的《蛾术篇》卷七十六中说：“公阳山之贬……是盖为王叔文等所排矣。”清代赵翼在他的《瓠北诗话》中也是这样说的：“先与柳宗元、刘禹锡交好，及自监察御史贬阳山令，实以上疏言事，柳、刘泄之于王伾、王叔文等，故有此迁谪。”清代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中说：“韦、王用事，退之为其党人所排。”

三是极论关中早饥，愈上疏请宽民徭役，得罪权贵所致。韩愈弟子皇甫湜在《皇甫持正文集》卷六《韩文公神道碑》中说：“（贞元）十九年，关中早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缙民徭，而免田租之弊。专政者恶之。行为连州阳山令。”宋代朱翌在他的《猗觉寮杂记》中说：“退之《赴江陵途中》诗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又云：‘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头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又云：‘适令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又云：‘僂俛不遐顾，行行谐连州。’则因论早饥贬阳山无疑，不知史何据而云论宫市。”宋代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援引了韩愈诗《赴江陵途中》和皇甫湜《神道碑》内容，证实韩愈阳山令之贬，乃极论早饥，新旧唐书以为坐论宫市乃谬误也。

韩愈贬阳山之因，三种说法，哪种为是？“极论宫市”的说法，在韩愈的著作中找不到依据。唐德宗（李适）晚年昏庸，听任宦官摆弄。宦官掠夺民间财物，在宫中设市贩卖，皇上观赏取乐。可惜韩愈当年所上奏章现已不存，但有以根据韩愈尔后所撰《顺宗实录》，“推知韩愈曾上书极论宫市”。韩愈《顺宗实录》是这样写的：“旧事宫中有要，问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

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与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韩愈在这里，显然是对德宗设立宫市的流弊加以抨击，实际到了顺宗(李诵)时期，指出宫市之弊者已有很多，韩愈也许是其中之一，但没有证据说明韩愈因此贬谪阳山。

说韩愈贬阳山是受王伾、王叔文、韦执谊之党所排挤，看来不太可信，主要是时间不符。韩愈遭贬是在德宗时代，而二王当政是在贞元二十一年春顺宗即位之后。当时，王伾、王叔文、韦执谊已成为一个政治集团，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是这个集团的骨干。他们的奋斗纲领是革新朝政，裁抑宦官、澄清天下。而当时的韩愈，其政治态度是较为保守的，从韩愈的一些诗作中，确有谴责王、韦集团之处，比如“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王伾、王叔文被贬，韩愈写了《永贞行》，骂王叔文等是“小人乘时偷国柄”、“一朝夺印付私党”，说他们“具书目见非妄征，嗟尔既往宜为怨”；在韦执谊从宰相职位被贬为崖州司马时，韩愈写了《忆昨行和张十一诗》，诗中说：“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指王伾、王叔文、韦执谊)悉破碎，羽窟元底幽黄能(能，熊属)。”这些都是革新集团失败遭贬斥之后写的诗，韩愈从维护朝廷出发，自然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判。此外，并未发现韩愈反对“永贞革新”的其他事实。

至于韩愈遭贬是不是跟柳宗元、刘禹锡加害有关呢？不少人抓住韩愈《寄翰林三学士》诗句：“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认为柳、刘泄语于王叔文他

们，使韩愈遭难。韩愈官御史时，和柳宗元、刘禹锡，尤其是与柳宗元的交情是十分深厚的。加上他们年少气盛，讥评时政必多，韩愈的被贬，也曾对柳、刘有过怀疑。但韩愈相信柳、刘为人正直，不会出卖朋友，所以他在同一诗中，继续写道：“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韩愈自己对柳、刘加害作了否定，不少人引用这首诗，偏偏爱删去这两句，又不通读全文，更不要说连同其他著作作出全面的分析了。至于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中说：“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公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主要说明，自己贬官实属冤枉。公卿徒慕虚名，提拔自己充任监察御史，得有机会接近天子，但京兆尹李实等畏惧弹劾，欺骗德宗，使自己遭到流放。此处“奸猜畏弹射”，显然是指李实，而不是指二王、刘、柳等。因为韩愈遭贬是在贞元十九年，而二王、刘、柳等一度掌权是在永贞元年。韩愈写的这首诗还拿给刘禹锡看，要求刘禹锡“属和”，看来把韩愈遭贬推之于老友身上，不近理，也不近情。

韩愈上疏极论关中早饥，得罪权贵，这才是他真正被贬的直接原因。这可以在韩愈的著作和《阳山县志》中找到证据。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关中“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当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写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极谏：“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臣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又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今瑞

雪频降，来年必丰，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韩昌黎全集》卷三十七）

当时的京兆尹（掌管京师的行政长官）是李实。李实是唐朝的宗室，唐高祖儿子道王元庆的四世孙，是一个专横跋扈、刚愎刻薄、不循法度、强征暴敛、不顾人民死活的人。新旧唐书均有记述，列其罪愆。《顺宗实录》云：“实方事李齐远（也是唐朝宗室，唐太宗儿子蒋王恽之孙，官至礼部尚书），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尝有诏免畿内逋租，实不行用诏书，征之如初，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至遣，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李翱说：“韩愈……为幸臣所恶，出守连州阳山令政。”（李翱《韩吏部行状》）幸臣指的就是李实。李实不止一次对德宗说：“今年虽旱，而谷甚好。”因此，虽然有减免租的具文，但他依旧不顾一切地严征暴敛，害得百姓毫无办法，有的把自己的房子零星拆卖缴税，有的把久远收益的树木砍伐出卖，甚至丢弃妻子，一个人外出逃荒，看到的满路都是奄奄待毙的人。沟壑之中，尸体暴露，无人掩埋。京畿地区，灾情如此之惨，别人也没有敢替老百姓讲话的。韩愈却把人们遭受的疾苦如实地全盘揭露出来并请求缓征，以救民命。这样，自然要触幸臣之怒了。其实，触怒的当然不只是李实一个幸臣，状中只敢提出京兆尹，而对皇帝还是要颂扬一番的。李翱只能说：“为幸臣所恶”，不敢直说为皇帝所恶。如前面所述，韩

愈遭贬，皇甫湜说：“专政者恶之，行为连州阳山令。”说的就是《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触怒专政者，专政者指的也是京兆尹李实。

就是这个李实，韩愈在贞元十九年离开四门博士职位后，曾上书对其大肆赞扬，歌功颂德：“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已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贼，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何其能及此。愈也少从事于文学，见有忠于君孝于亲者，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求效其恳恳。……进退维命，愈恐惧再拜。”（韩愈《上李尚书书》）韩愈文章，彪炳千古，但对李实如此阿媚奉承，后人是很有意见的，正如清代顾炎武说：“韩愈……投知求见之文，而不自觉其失言耶？后之君子，可以为戒。”（顾炎武《日知录》）韩愈在同一年，对同一件事（天旱人饥）前褒后贬，态度迥异，有人认为上书李实时，韩愈是在离任四门博士不久，其时对李实未必全面了解，恭维李实，只是讨好而已。但上书德宗，是在监察御史任上，是想尽到谏官的责任，欲为民除害，因此讲了实话。前后相隔半年，情况不断变化，韩愈对李实态度截然相反，并不奇怪。不管怎么解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状告李实，李实是万万容不得的，他要排挤、打击韩愈，那是很自然的。

韩愈贬阳山后，他自己是怎么看的呢？贞元二十一年（805）韩愈在阳山写了一首《县斋有怀》（《阳山县志》卷十六“艺文”编），写到了他贬阳山的经过：“捐躯辰在丁，铄翻时方

措，投荒诚职分，领邑幸宽赦。”（捐躯，是说舍弃生命，指决心为民请命，报效国家。辰在丁，指上疏之时日，古人以甲子记日，贞元十九年十二月，愈上天旱人饥疏。铩翮，残翅，喻贬官。措，通“腊”，周代十二月祭百神之称，公之贬阳山令，时出以十二月。投荒，贬谪，流放至荒远之地。职分，理所当然的本分。领邑，受邑，指愈为阳山令。）这四句诗是说，我就在这时报效国家为民上书给皇上了，却遭到贬官处分，正是十二月的时候，贬谪流放至边远之地显然是理所当然的本分，再受邑当县令得到宽大是太幸运了。这四句诗是韩愈贬阳山之因最好的解释。清代符翕任阳山县令时，写过一首《伟矣》诗，诗曰：“伟矣昌黎公，气钟山岳正。……岁值关中饥，抗疏拯民命。左迁来岭表，山城修一政。……”（《阳山县志》）也认为韩愈贬阳山，是由于上疏天旱人饥所致。

综上所述，韩愈贬阳山令之因是极论天旱人饥，得罪权贵所致。

论韩愈在阳山

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韩愈(768—824),贞元十九年(803),任监察御史,这一年关中大旱,韩愈向德宗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对官吏横征暴敛,请求朝廷宽免徭赋,结果被贬为阳山县令(见《试论韩愈贬阳山之因》)。

韩愈这次被贬,弄得十分狼狈:“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露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黜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说的是宦官来到家门,逼着韩愈立即离开京城。病重的妹妹躺在床上,估计到重逢无望,哭喊着请求与兄多讲几句话,也得不到准许。体弱多病的妻子抱着幼儿,也顾不得内外有别,当着宦官的面,忍着悲痛与丈夫拜别。想想自己早晨还是朝廷的谏官,傍晚却变成阶下囚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酸呵。韩愈无奈,忍着悲痛,离开了自己的家,离开了京城,与同时被贬的张署(被贬为郴州临武令)一起向南方进发了。

长安到广东阳山,相距三千八百多里。行期紧迫,只能在寒冬腊月翻过终南山,贞元二十年(804)春初才进入湖南,渡过连天波涌的洞庭湖,张署先到任所临武,韩愈独自翻过南岭,仲春二月才抵达阳山。

当时的阳山情况怎么样呢?“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

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送区册序》）说的是阳山是天下荒僻边远的地方，政权机构也不健全。按唐代建制，县有京县、畿县、上县、中县、中下县，下县六等。阳山属中下县。按规定，中下县应设县令、县丞、主簿、县尉各一人。但是当时阳山“县廓无居民，官无臣尉”，可见阳山之落后。不仅如此，“逾岭到所任，低颜奉君侯。寒酸何足道，随事生疮疣。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猿猴。生狞多忿恨，辞舌纷嘲啁。白日屋檐下，双鸣斗鸺鹠。有蛇类两首，有虫群飞游。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颺起最可畏，旬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忍潜遘，十家无一瘳。猜嫌动置毒，对案辄怀愁。”（《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中说的是阳山的自然条件、气候、人情风俗。因为自己贬官，见到长官必须低眉伺候。吏民的相貌全是山人样子，个个瘦黑得像猿猴。生性狰狞，容易动怒，语言嘲啁，全然听不懂，蜚鸟到处飞来飞去，两头蛇不时出没。深冬有时热得要摇扇，炎夏有时冷得要穿皮裘。更可怕的是颺风侵袭，风声在山陵间颠簸着，回旋着，像号哭，像叫喊。电闪雷鸣，惊心动魄。碰上病疠流行，十家难得一家幸免。稍有嫌隙便请酒放毒，对案而吃，真令人提心吊胆。这些诗歌对阳山的描写虽有些夸张，但其中挺重要的是渗透着作者悲凉愤懑的心绪。类似这样的描述，在韩愈的其他诗文中多次出现。如在阳山写的《县斋有怀》中，他说：“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雷威固已加，颺风仍相借。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乍。指摘两憎嫌，睚眦互猜讶。祇缘恩未报，岂谓生足藉。”就是说，阳